

揮筆灑墨 為所當為

相信文字具有力量是知識份子堅定不移的信念；
揮筆灑墨，為所當為則是知識份子的擔當。

目次

〈書評〉

- David Capie & Paul Evans, ed. *The Asia-Pacific Security Lexicon* 楊昊 1
- 石之瑜《文明衝突與中國》 吳昀展 4
- Eduardo Galeano *Las Venas Abiertas de America Latina* 蘇彥斌 7
- Janet V. Denhardt & Robert B. Denhardt *The New public Service: Serving, not Steering* 許俊湧 10
- Tim Dunne *Invent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 A History of English School* 楊立彥 13
- 吳思《血酬定律：中國歷史中的生存遊戲》 張師偉 16
- 中曾根康弘《日本二十一世紀的國家戰略》 葉紘麟 19
- David Held *Democracy and the Global Order: From the Modern State to Cosmopolitan Governance* 黃士豪 22

〈書目〉

- Merle Goldman & Leo Ou-fan Lee, ed.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馮先祥 25

政治科學季評

二〇〇四年九月
第三期



-
- | | |
|--------|---|
| 資深編輯顧問 | 高朗、石之瑜 |
| 編輯顧問 | 王順文、莊國銘、廖高賢 |
| 主編 | 陳蔚芳 |
| 編輯委員 | 林呈曦、陳俊華、曾隆盛 楊立彥、劉建宏、戴天楷 |
| 校外編輯委員 | 林御翔、邵軒磊 |
| 發行單位 |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 地址：台北市徐州路21號 電話：(02) 2391-8756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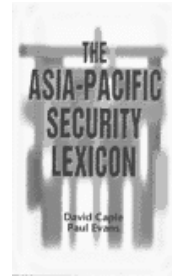
David Capie &
Paul Evans, ed.

The Asia-Pacific Security Lexicon

楊 昊 / 中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生

在國際關係研究中，「安全」是一個備受重視的關鍵議題。在概念層次上，安全象徵著穩定（stability）或秩序（order），從而在相對安全的狀態裡，戰爭或衝突的發生都將可能受到某種程度的約制。鑑於此，從傳統的軍事安全到 1990 年代中期所興起的人類安全（human security），學術界對於安全的本質與安全觀的內涵從事了頗為多元之討論，特別是安全觀本身亦在此種多元關注中進行演化與重構。由兩位加拿大學者 David Capie 與 Paul Evans 所編彙之 *The Asia-Pacific Security Lexicon* 一書，即是將安全觀的緣起背景、學理基礎及其相關辯論，維繫安全的概念、理論與途徑，以及這些相關發展在亞太地區的實踐與機制等三十四種安全詞彙（lexicon）¹ 進行整理，並嘗試提供理論與實務之對話平台。

基本上，本書係被定位為安全研究的重要工具書，對於研究者而言，實具參考價值。本書作者 Capie 與 Evans 在閱遍超過 2000 篇期刊論文、專書以及重要研討會論文後，企圖將範圍聚焦於數十個對亞太地區而言頗為重要的安全概念與實踐上，其中包括了東南亞區域之「東協模式」（The ASEAN Way）（pp.14-27）與「預防外交」（Preventive Diplomacy）（pp.185-197），以及由中國所提出之「新安全途徑」（New Security Approach）（pp.175-178）等，並針對各個不同的詞彙從事進一步地介紹、比較與細探。此舉不但清晰地反映了 1990 年代在亞太地區開始興起的新型安全概念之創新性與多樣性，作者亦從相



書名：The Asia-Pacific Security
Lexicon

編者：David Capie and
Paul Evans

出版者：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出版地：Singapore

出版日期：2002 年

頁數：224 頁

ISBN：9812301496

¹ 本書亦對交往（engagement）政策進行九種定義上與概念上的不同區分，是故全書實際上共囊括了 43 種相關安全詞彙。

關概念在西方學理上之回顧與辯論中，企圖釐清該概念在亞洲地區的實踐與自我定位。此外，在兩位作者與東南亞安全研究權威 Amitav Acharya 所合著的前言裡，再次強調本書之撰寫目的不但具有實務性亦頗具學理性，作者期待能藉由本書來作為相關政策制訂者與學術從業人員在參與安全相關之多邊活動（multilateral activities）時用以參考之重要知識依循（p.2）。

針對 *The Asia-Pacific Security Lexicon* 一書之結構，雖然作者原意係以字典的方式（按字母順序編排）來進行相關細目之安排，以便讀者查詢之用；不過，在閱讀時，筆者建議讀者或可透過「演化途徑」（evolutionary approach）之觀點來理解相關安全概念與實踐的演化脈絡，此一脈絡或可從下列兩個角度切入理解：（1）在維繫安全的途徑上：從最為傳統的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pp.28-38）與強權協調（Concert of Powers）（pp.76-81），歷經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集體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pp.53-58），再過渡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歐的共同安全（Common Security）（pp.59-63）、1960年代東協成立後的東協模式、1980年代的合作安全（Co-operative Security）（pp.98-107）、以及1990年代由中國所提出的新安全途徑等多元實踐，這些頗為豐富的安全發展除了象徵著近年來亞太地區在安全維繫上的多樣努力及成就外，確實亦間接地描繪出亞太地區在維繫安全途徑上之不斷演化過程；（2）在安全所涵蓋的範圍上：在早期由現實主義（realist）學派所強

調之國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觀中，軍事力量一直是國家安全的理論基礎，也是追求國家對外政策的重要目標。不過，以軍事安全為主的權力平衡觀，在國與國之間的互動關係愈益複雜之影響下，逐漸在1970年代之後平緩地朝向綜合性安全（pp.64-75）之方向發展，而此一綜合安全所涵蓋之範圍實已超溢純然軍事之範疇，從而納入經濟、社會、政治、環境等不同面向之安全考量。到了冷戰結束後，由聯合國所提出的人類安全（human security，亦有人譯為「人身安全」）概念（pp.139-146.），強調現今所關注的全球安全應該要跳脫傳統的國家安全關注侷限，拓展到對於人類與地球的關懷上，因而進一步將安全研究之分析層次（level-of-analysis）向下延伸到個人的生存與安全考量，從而使得今日安全研究之範疇日益擴大也愈益複雜。筆者認為，在閱讀本書之際，若能從上述兩個角度切入，將會對亞太地區之相關安全概念與實踐的演化脈絡有更為全觀之瞭解，讀者亦更能體會該書在安全研究（特別是在亞太區域安全）上之貢獻。

誠如作者於書中所提及，*The Asia-Pacific Security Lexicon* 一書雖然旨在針對安全詞彙進行整理，不過在比較、對照與整理的過程中，筆者發現不少因區域安全局勢的瞬息萬變以及多元安全觀的並存所衍生之問題。不過，在此要提醒的是，Capie 與 Evans 強調本書之撰寫訴求僅在於提供一套結合學術與實務的演化視野，嘗試從宏觀的角度提供有系統的歷史背景來進行安全相關概念之釐清與比較（p.2），而非追尋某種解決問題之工具

性目的。就此，全書之安排確實讓讀者針對不同的概念與事件有更多自行沈澱、反省的空間。不過，因為 Capie 與 Evans 兩人所回顧之文獻主要以 2000 年 9 月以前為主，雖然已初步描繪出亞太安全的演化脈絡，但諸如 2001 年 911 事件對亞太安全之衝擊、2003 年東南亞國家協會在「巴里第二宣言」中所提及的東協安全體(ASEAN Security Community)之概念與宣示，以及近期的「六邊會談」等事件在安全研究之理論與實務上的意涵，仍有待再版時進一步補述。

此外，*The Asia-Pacific Security Lexicon* 一書有另一個特點，即在每一個安全詞彙的析論後皆附有相關說明 (note)，在此說明中藏有相當豐富之文獻可供研究者參酌，無論是在國際安全局勢之發展方面、發展官方文獻之出處方面、安全研究或國際關係理論之依據方面、或者是相關辯論之源由上，皆能有利於讀者從事系統性地延伸閱讀與研究。◆

石之瑜

文明衝突與中國

吳昶展 /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

本書開宗明義就顛覆了文明衝突，認為文明衝突的現象才是造就了中國這個概念的形成，因為中國在文明衝突的情境下被重新認識，塑造了我們對中國的理解，所以中國和文明衝突的關係是彼此交錯共生的，而非如一般所理解的，是因中國才有文明衝突。

作者不只一次地呼籲，本書的內容應由讀者自行來詮釋，中國和文明衝突之間的對話作為一個被分析的文本，是提供給作者和讀者大眾共享而非一人所專擅，當然也包括書評人。主觀的情感為此書的經緯，客觀外在的情境由此突顯其張力，讀者和作者皆可在此擁有自己的發言權，簡單來說，就是大家可憑自由心證去理解本書，而不用被限制在單一的思考架構裡面。因此，本書並非建構一個文明衝突與中國的知識架構，而是將自身作為此現象的某種姿勢而在讀者心中呈現。這種深具後學的態度，也提供書評人自由選擇分析框架，乃試以文本詮釋方法作出自己的理解，將此書倒轉，從後四章的香港和台灣出發，再回到前四章的中國及比較歷史。

一、香港和台灣

東方明珠以及美麗之島作為進入中國的跳板和前殖民地，其心理狀態和文明想像提供了對中國這個概念感興趣的理論家們一個出發點，作者分別在第八和第六章以香港文化界面對回歸和台灣學界在處理全球化和民族主義議題時所面對的困境作出分析，透露出作者對香港成為超越後殖民以及發揚中國文化的世界文明交匯處之期待，也突顯其因身處台灣學界而得面對的問題意識和無法避免的焦慮。



書名：文明衝突與中國

作者：石之瑜

出版者：五南出版社

出版地：台北

出版日期：2000年1月

頁數：296頁

ISBN：9571119857

香港的文化發展在港英時期以商業活動來推展的結果，造成本土文化無法以其習慣的方式表達，文化作品當中的主體從而移轉並疏離本土，也就是說，內斂、重神韻表現的情感被迫以突顯個人主體再現的多元自由主義方式表現。作者指出，港人作為西方意識裡的港人，要進入西方認可的文化領域中，得依賴其身後的中國聽眾，否則香港有什麼奇特的地方吸引他們的目光呢？因此，香港要成為一座文化橋樑，得立基於中國文化之上，藝術的評判標準也就應轉變成為貢獻，而非自我突顯。

本章最後揭示了香港文化與中西文明的不同，證實文化共生的存在可能，從而使香港更肩負調和不同文化的使命。相較於對香港的樂觀態度，作者對台灣學術界在歐美影響下追求自身主體性的態度就悲觀得多。他從全球化和民族主義對主權秩序提出的挑戰切入，指出在後冷戰時代的社會科學家因客觀中立的要求而左支右絀，只能在一方面適應新局，另一方面維護自身的科學地位而將主權機制加以修正。而此問題在後殖民台灣身上更顯尷尬，因其自身並無一被確認的主體地位，在面對主權地位的挑戰時更加無所適從。

第七和第五章則分別以畫家針對香港回歸和台灣女性針對全球化的觀點，將台灣文化和香港文化作出一番別出心裁的文本分析。香港的民族認同問題既起於中國人與英國人對香港未來的不同期待，因此其文明回應方式也有兩種，但皆是操之在他人之手而非港人所能決定。中英的期待是因為回歸而產生，而由此所產生的互

動，作者認為並不是文明融合而是一對抗的過程，此可由畫家筆下窺其一二。

文明對抗的兩造當然是指中西，但中國和西方這兩個概念卻同時需要彼此指涉才能有一清楚的輪廓和定位，事實上，吾人在理解中國時常未能有一清楚的定義，代表在理解中國時，我們所使用的前提也是不清楚的，而可能類似於後殖民主義或是女性主義的知識論所說，是一陰陽共生的混血知識前提。作者在此一認識下探討台灣女性在殖民者/被殖民者，本土/買辦意識之間，發揮的緩衝作用，使得夾在中國和西方之間的台灣不會因為全球潮流的介入而無法適應，而有其自我調適的手段：一方面，女性滿足了西方對台灣的女性化期待，也就是西方眼中的台灣是原始、純潔，應被保護的；另一方面卻也使台灣將中國女性化以獲得主體性。

二、創造中國

作者在第三章裡，以蔣宋美齡夫人為例，說明女性化的中國是如何被美國所理解，進而在外交場合和國際戰略上作出調整；但中國在西方的眼中不只有被女性化的嫌疑，其文化心理更被認為是一個類似於納粹的權威人格或長不大的吃奶民族，致使民主難以真正落實生根。但是女性化中國和權威人格中國卻並非自然成型，而是有理論的背景依據和需要所致。在第二章中，作者援引制度的建立過程，論證權威人格可能是文化與制度的不協調所引起，諷刺的是，西方學者援引來遏止權威人格蔓延的自由主義制度，恐怕就是那催化權威人格發

生的決定性因素，而雙首長制度也就是自由主義與不同文化交會時所創造的權威人格制度。

但是西方與中國之間的文明互動並非單向進行，而是交錯且混雜難辨的。美國與中共的關係就是作者在第四章拿來討論的例子，兩種不同根源的民族主義大國，在冷戰結束的二十一世紀裡的交往，突顯了彼此因凝視角度的不同產生對彼此相應的概念與想法，而在外交政策和彼此的往來的聯繫下，雙方的成見和誤會也不再只是單純的立場問題，更牽涉到利益與情感，難以一以貫之。作者在本章中，思以民族主義為仲介，而以實證主義的模型彌補後實證的詮釋學派的不足，認為學者在援引後學理論時，不該就此將此立場固定，而產生另一種形式的霸權論述，換言之，對主體的解構不該又重回僵固的建構。

三、逃離文明衝突

在作者的帶領下，或者是書評人對作者所作的詮釋下，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個不斷變動的文明模樣，從香港/台灣在與西方/中國互動而產生的反應、理解和想像而進入中國；從中國與西方彼此的理解、交往而回到對自身主體的關注。作者在第一章即點出全書的關心所在，即因對主體性追求而生的焦慮，可能是由於缺乏那明確的主體，但卻又對此主體有深刻的關心及渴望所致。

主體的取得，似乎是現身的唯一方法，也就是誰具有主體性，誰才有發言權，同性戀者、後殖民台灣和戰敗國日本的文化，處處透露了對發言

權的需求。作者要問的是，為何會有對主體的期待？為何會有權威人格的批評？為何會有女性化中國的存在？為何中國會是一個主權國家？這些問題，指向了各種中國論述的關心前提，所以回到本書標題，文明衝突所爭的，不外是一個發言權，那麼本書的問題就是，為何發言權的爭奪會成為我們的問題意識？

倒過來說，文明衝突的先決條件就是使發言權的爭奪成為眾人關心的所在，所以文明衝突本身就成為一種政策，讓不同的文明在多元文化框架之中彼此激盪。只有看穿文明衝途本身就是一種建構，認清發言權的取得並不能靠爭奪而可以寬容異己的方式取得，我們才能正視自己，正視台灣，正視中國。◆

Eduardo Galeano

Las Venas Abiertas de America Latina

蘇彥斌 / 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在前往著名的 Otavalo 市集途中，從車窗外偶然瞥見路邊的一大捆乾柴，竟緩緩地往山上的方向移動。正感納悶之際，才驚覺乾柴下原來是一個年約十五歲、身著印地安傳統服飾的女孩，駝著背，用眼角餘光看路，一隻髒兮兮的小狗跟在她旁邊。

友人說，安地斯山原住民的生活方式，幾百年來沒有太大的改變。

1999 年暑假因緣際會，我有幸遠赴南美洲的厄瓜多爾遊學。在最後一堂西班牙文課結束之際，我請求家教老師推薦一本拉丁美洲史的相關著作。在大學裡講授文化人類學的 Amanda 毫不遲疑地說：*Las Venas Abiertas de America Latina*。她補充道，「這是一本經典。在拉丁美洲，凡是識字的人都看過這本書。」

Las Venas Abiertas de America Latina 成書於 1970 年，中文譯為《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目前只有簡體字的翻譯版本。作者 Eduardo Galeano 在當時是一個烏拉圭籍的新聞記者，現為專職作家，在國際左派評論圈頗有盛名。關於本書的目的，Galeano 說的很清楚：「寫這本書是為了與人們交談。外行作家對外行讀者說話，是想公布官方歷史，即揭發被勝利者隱瞞與謊報的歷史。」

在國際政治經濟學界中，不少學者因為服膺主流學術霸權而屈從實證主義的墨守成規，對於第三世界發展的研究，常常脫離實存的政經脈絡；在研究拉丁美洲時，也大都用冰冷、欠缺人文關懷的經濟學數據來「定義」拉丁美洲的處境。然而，本書作者卻盡可能地旁徵博引、搜集各類史料文獻，用



書名：Las Venas Abiertas de America
Latina

(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

作者：Eduardo Galeano

譯者：王玫等譯

出版者：人民文學出版社

出版地：北京

出版日期：2001 年 11 月

頁數：330 頁

ISBN：7020034977

拉美人長期被壓抑的話語，娓娓道出殖民主義在拉丁美洲留下的傷痕。作者對1581年的印第安人處境有如下的描寫，「費利佩二世在瓜達拉哈拉法庭斷言，有三分之一的印第安人已被消滅，倖存者必須為死者交納賦稅。此外，這位君主還說，印第安人是可以買賣的。他們在露天住宿，母親把自己的孩子弄死免得他們在礦區遭受磨難。」他更生動地描述在殖民時期，拉丁美洲的金、銀、錫、銅等「血管」被西班牙、英國、美國等帝國硬生生切開，將其「血液」輸進其國內以從事發展，豐饒的拉丁美洲便開始日益削瘦、病痛纏身。新殖民主義時期的60年代，「巴西政府准許美國空軍在蘊藏著豐富戰略性資源的亞馬遜平原上空拍照，美國空軍使用最先進的技術手段獲取了所有重要情報。此後不久，巴西兩千萬公頃的土地被出售或強占，而這呈條帶狀的土地正是蘊含著鈷、鈾等資源的地區。二十多個美國新教傳教團在亞馬遜地區的特定定點傳教，教授英語，並在這片地區發放避孕藥以控制生育，為的是要切斷當地居民與土地的關係，使土地專為開發礦產之用。」

作者用小說的方式敘述拉丁美洲的政治經濟發展，沒有嚴謹的年代先後安排，更不按照國別鋪陳；每個小章節表面上是相互獨立的故事，彼此卻又有密切的關聯。這種鬆散的敘事結構，即便讀者從書中任何一頁開始閱讀，也能迅速進入拉丁美洲綿密、永無止盡的悲慘時空。「正如人們所說的，拉丁美洲不發達的歷史成就了歐美資本主義的發達」。在本書中，拉丁美洲的落後是一種惡性循環：殖民帝

國所施加的壓迫與剝削造成拉丁美洲的落後，而拉丁美洲卻還必須承擔「輸血」後的惡果：過度都市化所造成的巨大城鄉差距、各種環境汙染、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下被注定的分工位置等等，使拉丁美洲難以脫離低度發展（underdevelopment）的困境。然而，作者在對殖民主義進行猛烈的批評以及激昂的控訴之後，並未明確地提出具體的改革行動方案，使整本書讀來令人格外沉重，彷彿拉丁美洲要擺脫悲慘的命運，唯有訴諸「徹底而完全地切斷與帝國主義的關係」一途，別無他法。然而，如何切斷？歷史上出現過哪些努力？除了切斷這種關係之外，是否還有其他方法？本書卻沒有進一步探討。從其他拉美史料來看，在險峻的情勢下，拉美人並非如此不堪一擊的。描述拉丁美洲歷史，卻未對拉丁美洲農工運動的團結合作和游擊隊不屈不撓的抗爭多所著墨，可說是本書的一大缺憾。

作者在文末指出，「本書得到的最好評價並非來自有名望的評論家，而是來自軍事獨裁政權，他們禁止此書的出版與流通就等於稱讚了它。」由於距離的關係，台灣人對於拉丁美洲歷史中深沉的苦痛不僅十分陌生，更深深受到具有新自由主義偏差的「文化」觀點所影響，認為拉丁美洲的不發達皆來自其人民「懶散的天性」；媒體則特別喜好報導拉美神祕的古文明、狂熱的足球賽事與盛大的嘉年華會，更加深了台灣人對於拉美的偏見。從人類學的角度來看，Bartolome de Las Casas 在其《西印度史》中曾提過，拉丁美洲人並非遊手好閒，而是舒適的自然環境與豐富的資源使其能輕易

地滿足基本需要，不必為累積財富傷腦筋，而且能用大量剩餘的時間從事文化活動，「在西班牙人來之前，他們的生活更合乎自然規律」。而從本書的觀點來看，「貧困並非是命中注定的，不發達也不是上帝的黑色旨意」，拉丁美洲人「不重視效率」、「今朝有酒今朝醉」等右派所認定的「不良習性」並不是與生俱來，而是資本主義全球化下的結果。

《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一書，並非只為了激起讀者的同情心與憤慨而已，而是用政治學、經濟學、人類學的角度來呈現歷史的面貌：一方面控訴殖民主義的罪惡，拆穿征服者的謊言；一方面為拉丁美洲長期以來的不平等進行溯源，打破殖民者粉飾的歷史。《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雖然沒有精緻的理論分析，但是卻對於拉丁美洲區域發展的過去與未來，提供了極具參考價值的詮釋觀點。任何關切國際南北對抗、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以及發展中國家議題的讀者都應一讀！◆

Janet V. Denhardt &
Robert B. Denhard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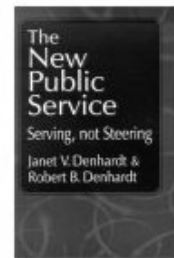
The New Public Service: Serving, not Steering

許俊湧 / 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本書作者丹哈特夫婦（Robert Denhardt and Janet Denhardt）分別就傳統公共行政（或稱舊公共行政）（the old public administration）時期與後來的新公共管理（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時期下的各種主張與概念加以闡述比較，在檢討前兩種治理模式之後，更進而倡議以新公共服務（the new public service）來為公共行政學提供一個新的思維模式與方向。

本書共分成十章，第一章是介紹整個公共行政學界發展的系絡，尤其是集中在舊公共行政與新公共管理的兩大思潮內容，同時作者也描述了兩大思潮所帶來的爭議與缺失。在第二章中作者簡單地說明新公共服務的基礎理論與其核心概念。接下來從第三章到第九章，則是依序安排了新公共服務所提出的七項論點，每一個論點都是各章的核心命題，作者先鋪陳舊公共行政以及新公共管理與命題相關的論點（不論是相似或相異），之後再論述新公共服務的主張與看法。最後，在結論當中吾人可察覺作者企圖將之付諸實行，而不只是紙上談兵而已。新公共服務的理論基礎有四：第一是民主公民精神（democratic citizenship）；其次是社群與公民社會的模型（models of community and civil society）；再者為組織的人文主義與新公共行政（organizational humanism and the new public administration）；最後是後現代的公共行政（postmodern public administration）。從這四大的理論基礎，新公共服務發展出七大論點主張以作為實務上的思考方向，包含：

第一、服務的對象是公民，而非顧客（Serve



書名：The New Public Service:

Serving, not Steering

作者：Janet V. Denhardt and

Robert B. Denhardt

出版者：M. E. Sharp, Inc.

出版地：New York

出版日期：2003 年

頁數：199 頁

ISBN：0765608456

Citizens, Not Customers)：公職人員 (public servant) 應該著眼於公共利益，並與公民建立信任與合作的關係，而不只是回應顧客的需求，因此，新公共服務非常強調公民的參與地位。新公共服務論者眼中的公民不是舊公共行政下被統治的人民，也不是新公共管理下所強調地位至上的顧客，公民必須與政府共同治理，共同分擔治理責任以產出具有品質的服務。

第二、追求公共利益 (Seek the Public Interest)：舊公共行政認為追求公共利益是民選官員的分內事，公職人員只要遵守價值中立與持有專業知識並依法行政就好，公職人員對於公共利益的追求並不積極；在公共管理中，由於個體行為總是自利的，在市場規則的運作下，公職人員不可能追求公共利益。而新公共服務下的公職人員必須在公民、社群與民選官員之間扮演更積極關鍵的角色，促使政府追求公共利益。

第三、重視公民精神甚於企業家精神 (Value Citizenship over Entrepreneurship)：舊公共行政下的政府行動是權力一把抓的政府，事必躬親卻毫無效率；新公共管理的浪潮使得政府師法企業家精神，能不做的事就不要做，但又削弱政府追求公共利益的動力與公民素質的培養，所以新公共服務論者主張公共利益是要由公職人員和公民共同努力，而非操之在企業管理者之手。

第四、策略思考，民主行動 (Think Strategically, Act Democratically)：新公共服務下的政策執行是政府與公民的共同責任，而不僅是舊公共行政主

張的由上而下地執行或是新公共管理的市場決定論，公民可以經由許多方式，例如政府授權，全面地參與政策過程，使治理具有正當性與相互成長性。

第五、課責並不容易 (Recognize that Accountability Is Not Simple)：作者強烈地批評新公共管理對民主課責所帶來的戕害，因為新公共管理太強調利潤的追求，對於規範制度過度漠視。因此，新公共服務主張公職人員要致力於道德規範的遵守與依法行政，因為他們是要對全民負責，而非如新公共服務下的經理人，只對民選官員負責。

第六、服務而不是掌舵 (Serve Rather than Steer)：舊公共行政下的領導是繫於單一的權力核心，並使政府能把所有事情都做好；新公共管理下的領導則被集體抉擇所取代，用市場誘因與競爭方式達到傳統領導的效用。新公共服務論者主張以分享式的領導 (政府、公民與社群共享的領導模式) 來取得治理上的多數共識，公職人員不再一手掌握治理方向。

第七、重視參與者，而不只是生產力 (Value People, Not Just Productivity)：針對政府內部的管理，舊公共行政主張透過控制手段管理公職人員，新公共管理則偏好以誘因促使公職人員提高生產力，而新公共服務強調的是要珍視公職人員，經由組織的參與式管理，讓公職人員有向上自我實現的感覺，重視其意見並上下相互尊重，使其能有更大的揮灑空間。

最後，作者將焦點置於新公共管理與新公共服務的比較，前者過於簡化公共利益與民主價值，一味地強調

顧客至上，使新公共管理的視野過於窄化。我們必須為我們共同的生活負責，生活在我們周遭的人也必需共同分享與承擔我們所決定的任何事，作者希望大家一起加入建立新公共服務的行列。

本書主要的論點多數是針對新公共管理的缺失而來，認為一味地讓政府治理走向市場化與競爭化會導致公共利益與公民尊嚴的喪失，並試圖提出新公共服務的思考方向來彌補此一惡化的趨勢。新公共服務藉由公民與政府雙方的共同治理來提高治理的品質，並帶給整個社會更高的社會資本。

在新公共管理的浪潮之下，企業型政府與政府再造等議題變成現今社會關切的熱門話題。人民在早期大政府神話的催眠下已變得事事仰賴政府，而政府現今在新公共管理的潮流下，一改過去事必躬親的態度，師法企業以減少財政負擔，並藉此提高市場競爭的活力。但是人民呢？還是那樣地依賴政府。在人民眼中，政府還是高高在上的政府，大大違背了Denhardt 夫婦所倡議的政府與公民的共同治理。

新公共服務認為社會上沒有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分別，也沒有提供服務者與顧客的分別。所謂的「治理」是政府與公民（或是社群）雙方位居平等的地位，公民有利他的取向，也會為整體社會付出心力。公民參與是新公共服務最具核心的概念，也因為公民的全面性參與，才得以避免新公共管理中自私的利益競逐，進而重新回復人性的尊嚴與價值。

本文認為，傳統的大政府思潮已經對於公民精神的養成產生根本性的

抑制作用。在代議政府的產生是經由選票多寡決定的前提之下，候選人亂開競選支票並譁眾取寵的情形處處可見，我們也常常看到人民對著政府官員破口大罵，或是上演攔轎喊冤等荒謬情節，也許對他們來說，這樣的表達方式才能與政府的治理模式互搭上線，新公共管理也無法解決這樣的難題，因為他們忽略了公民在治理模式中的角色扮演。在政府討好選民以及人民唾罵或憐求於政府的惡性循環之下，政府與人民的關係總是相互耗損，毫無相互增強與成長的趨勢，這對於強調政府與公民共同治理的新公共服務論者來說，就像是揮之不去的可怕夢魘。

放眼現今臺灣社會，朝野依然沈溺在新公共管理的美好氣氛當中，當今政府還在思索著要如何打造一個具有效率的政府組織，帶給顧客（人民）具有效率的服務內容。單方面地滿足顧客並不能使之有所成長，新公共服務論者希望把具有效率的政府轉換成具有民主價值的政府，另外再把被服務的顧客轉換成「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良善公民，在政府與公民雙方的共同治理之下，整體社會素質的提升並非難事。

不過，公民社會的建立在實務上尚有相當程度的困難，然而新公共服務對於新公共管理種種一針見血的指正，以及關於社會治理模式的討論，勢必能在理論與實務上激起更大的論述漣漪。◆

Tim Dunne

Invent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 A History of English School

楊立彥 / 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許多國際理論的書籍都指出，國際關係這個學科自出現以來至少已出現過三次的大辯論：第一次是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針對國際關係的本質進行辯論；第二次是行為學派與傳統學派對於研究方法的爭論；第三次則是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度主義針對無政府狀態下合作之可能性的激辯。

然而，除了前兩次的大辯論有部份歐洲學者參與外，第三次大辯論的參與者主要為北美的國際關係學者。北美學界在國際關係理論發展中的強勢地位，使我們對於其它北美地區以外發展出來的國際理論無法深入地認識與了解。因此，英國愛塞特大學（University of Exeter）高級講師 Tim Dunne 著成《發現國際社會》（*Invent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一書，企圖向世人介紹一個具有深厚傳統且源自英國的國際理論——英國學派（English School）。

在《發現國際社會》中，作者對英國學派的名稱由來、發展起源、理論內涵與代表人物做了詳細的介紹。本書共分為十章，其中並有五章介紹英國學派中重要學者的思想，包括：Herbert Butterfield、Martin Wight、Adam Watson、Hedley Bull 與 R.J. Vincent 等人。作者認為「英國學派」一詞源自於 1981 年 Roy Jones 發表的評論文章，該文對英國學派的理論多所批評，並認為英國學派的發展即將劃上句點並走入歷史。然而英國學派卻未如 Jones 所料，從國際理論的舞台上消失，反而持續發展與茁壯。

關於英國學派的發展起源，學界有許多不同的看法，作者則認為其起源於 1959 年成立的「不列顛國際關係理論委員會」（the British Committee o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作者並以兩個章節



書名：Invent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
A History of English School

作者：Tim Dunne

出版者：Palgrave Macmillan

出版地：Basingstoke, UK

出版日期：1998 年 10 月

頁數：225 頁

ISBN：0312215452

的篇幅來論述該委員會的運作以及其與英國學派間的關連。不過，該委員會雖然名為不列顛，然其資金來源卻是美國的洛克斐勒基金會 (Rockefeller Foundation)。該委員會最初成立的目的是在於超越舊有的國關理論思維，並跳脫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之間的辯論，轉而將研究焦點置於國際社會的本質與結構，而由於 Martin Wight 等五位英國學派的早期學者也是其中的成員，因此對英國學派的理論發展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作者認為英國學派與其它國際關係理論的分野有三：

第一，對特殊研究傳統的自我認同，意即英國學派的學者皆認同自國際法學者格老秀斯 (Grotius) 以來的理性主義 (rationalism) 傳統。英國學派的理性主義與北美學界的理性主義雖然擁有共同的名稱，卻在內涵上迥然相異。北美理性主義的核心假設在於「人是理性自利的行為者」；英國學派的理性主義則是相信一個由國家所組成的國際社會，並以探究其本質為職志。

第二，詮釋的研究方法。有別於北美學術對於實証主義的偏好，英國學派對行為科學抱持懷疑的態度，並堅持以傳統的詮釋途徑從事國關研究。

第三，規範的國際關係理論。英國學派的理論帶有濃厚的規範色彩，主張國際社會的存在是可欲的。而究其主張又可細分為二派，其一強調秩序，認為國際社會存在的目的在於維護國家間的秩序；另者強調正義，認為國際社會存在的目的不僅止於秩序的維護，更在於正義的實現。

從以上特徵中可以歸納出幾點英國學派的理論主張：首先，英國學派的本體論 (ontology) 為國際社會，其研究的重心是國際社會，包括對其本質、制度與演變的研究；其次，就方法論而言，英國學派屬於第二次大辯論中的傳統學派，主張國際關係的研究應從歷史、哲學與國際法等角度出發，並對行為學派的主張抱持懷疑與反對的立場；最後，由於英國學派不相信國際關係能運用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因此反對以客觀中立為藉口而逃避對道德與規範問題的處理。

本書最爭議之處在於，作者將 E.H. Carr 這位被公認為古典現實主義的代表學者列入英國學派之中，而將對國際社會有深入研究的前倫敦政經學院教授 Charles Manning 排除於英國學派之外。作者認為 Carr 的思想帶給英國學派許多啟發，例如，Carr 在其所著之《二十年危機》中率先指出國際關係學不能以自然科學的方式研究；另外，Carr 對於道德與權力不可偏廢的立場，也引導英國學派跳脫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爭論而走出自己的道路；而由於 Manning 並非「不列顛國際關係委員會」的成員，加上其混合現象學 (phenomenology) 與法理學 (jurisprudence) 的研究方法，與英國學派的大老 Martin Wight 所主張的歷史與哲學研究方法格格不入，因而被作者排除於英國學派之外。

作者將 Carr 納入而排除 Manning 的作法受到許多書評人的攻擊，而筆者也認為作者的論述易引人非議。若將 Carr 與 Manning 置於同一標準檢視，兩人皆未曾參與「不列顛國際關係委員會」，且同樣對英國學派有啟發

作用，例如英國學派中的指標人物 Hedley Bull 便自承受到 Manning 的思想影響很深；更重要的是，Carr 曾明確表明不相信有國際社會的存在，這明顯與英國學派所重視的傳統大相逕庭。以作者檢驗 Manning 的標準用以檢驗 Carr，便可發現作者的認定標準大有問題，而這種的雙重標準也是本書最令人迷惑之處。

另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為英國學派的名稱，即是否有更適當的用詞可形容此一學派。例如曾有學者主張以「國際社會學派」來取代英國學派，因為此一學派的研究焦點為國際社會，故以之命名將更為貼切，且以「英國」為名，不免帶有地理與文化上的意涵，易予人此一學派的學者皆為英國人，或是此一學派專屬於英國的錯覺。對此，作者曾回應指出「英國」一詞對他而言並無任何的地理與文化意義，故實在沒有改名的必要。然而，也許是因為作者身為英國人，使他並未查覺到「英國」所影射的意涵，因而不願意改採名實相符的「國際社會學派」之名稱。

本書正如其名：「發現國際社會」，作為一位發現者（inventor），Dunne 以自我的方法與角度，理解並重新詮釋英國學派的歷史發展，也打破一般人的既有認知，將 Carr 列為英國學派中的一員，並試圖鞏固自 Jones 以來，學界對英國學派的稱謂。雖然書中仍有許多作者自我的主觀詮釋與令人困惑的評判標準，然而基本上，本書的內容仍有助於吾人深入了解英國學派的思想。◆

吳 思

血 酬 定 律： 中 國 歷 史 中 的 生 存 遊 戲

張師偉 / 西北政法學院政治與公共管理系講師

在制度經濟學的影響下，各種各樣的制度研究越來越成爲學術思想界的靚麗景觀，不論是社會經濟領域，還是政治生活領域，都先後湧現出了許多研究制度的專著及論文。人們對制度的解釋雖然各式各樣，但大都受到西方學術傳統的影響，強調社會博弈及價值正義等在制度形成中的決定性影響，雖然西方學術界同樣強調了規則的多樣性和多層次性，但仍然沒有扭轉人們將其注意力集中在正式制度方面的僵局。因此，不論是對西方制度系統亦步亦趨地模仿，還是企圖迅速實現創建現代制度的美夢，都再明白不過地說明中國學者對制度的理解基本上還處起步階段。

吳思所著《血酬定律：中國歷史中的生存遊戲》（中國工人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對中國制度系統的解釋具有令人信服的邏輯力量，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中國學者在制度理解方面所達到的新高度。《血酬定律：中國歷史中的生存遊戲》將中國社會中的政治規則分作三個層次：其一是所謂正式規則，它建立在冠冕堂皇的政治價值基礎上，其基本的存在形態是各式各樣的官樣文章，即所謂「官話」；其二是潛規則，它是建立在赤裸裸的利害計算的基礎上，其基本的存在形態是官場中「未必成文卻很有約束力」的各種危害性慣例，實際支配著人們的社會生活，其地位和作用相當於「地方話」；其三是元規則，它僅僅包含那些深藏於各種規則背後的「決定或選擇規則的規則」。

「元規則」的提法出現於西方的政治名著中，



書名：血酬定律：中國歷史中的生存遊戲

作者：吳思

出版者：中國工人出版社

出版地：北京

出版日期：2003年8月

頁數：224頁

ISBN：7500830874

英文原文是“meta-rules”，用來稱呼「那些決定或選擇規則的規則」。吳思雖然接受了西方學者的元規則的涵義，卻明顯不認同西方學者對「潛規則」內容的把握，認為「他們的說法，只有加上苛刻的限制條件之後才是對的」。如果說西方學者眼中的元規則是正義性和多數原則等，那麼，吳思所謂的元規則不過是「橫規則」，即「暴力最強者說了算」「暴力競爭的勝利者說了算」的規則。實際上，「暴力」不僅可以「壓倒所有規則」，還可以任意改變規則。中國歷史的基本事實也正是如此，不論是獨尊天下的帝王，還是橫行霸道的地頭蛇，他們都憑藉著不可抵抗的暴力，而擁有在自己可控範圍內為他人制定規則並任意改變規則的絕對權力，當群眾不敢反抗並不能反抗的時候，暴力集團的絕對權力就變成了無限的合法傷害權，這種合法侵害權是一切社會規則的基本起源。

「暴力競爭的勝利者說了算」的元規則對中國的政治社會產生了深遠的歷史影響，使得中國社會中有勢力的政治集團和經濟集團幾乎都是依靠血酬生活的暴力集團，其最基本的謀生手段惟有暴力。正如思想家顧准及劉澤華等所言，中國政治社會中多的是依賴暴力生存的血酬集團，而缺少那種勤勞致富和經營致富的資本集團和工薪集團。不僅每個王朝的開創者都是某種具有博命性質的血酬集團，而且各級各類官僚及衙役等也同皇帝一樣，他們大多靠劫掠民衆為生，甚至中國的資本集團和工薪集團也極力通過讓血酬集團獲得硬股的方式，把自己變成血酬集團的一部分，一方面，

依靠或投靠血酬集團可以更快地發家致富光宗耀祖，另一方面，不依靠或投靠血酬集團就難以生存。

時至今日，我們仍然發現，許多經濟集團或公司企業仍然以有官方背景為最佳發展手段，而發展迅速的經濟集團一般也都有某種形式的官方背景。實際上，中國政治社會中剩餘勞動力及被擠出生產者大軍的閒散人員絕大多數都迅速地變成了某種形式的血酬集團，他們或者落草為寇，打家劫舍，剪徑揩油，或者為官一任魚肉一方，或者揭竿而起「弔民伐罪」，或者從龍從鳳充當走卒與炮灰。中國歷史上充滿了匪變官、官變匪的政治故事，而中國大地上更是見慣了官匪角色集於一身的社會角色，官與匪的區別其實意義不大，兩者對管轄物件徵收的錢財的性質幾乎完全一樣，其收入中的大半屬於敲詐性質的血酬。

各種各樣的血酬集團並不在意社會的公理和公意，更不是真的為了救民於水火或驅除天下的大害，他們真正關心的是自己的生命風險和最終獲得的血酬，而且各個暴力集團都會在儘量減低自己生命風險的情況下追求自己血酬的最大化。如果說土匪的勢力範圍猶如個人私產，那麼只要該私產能夠帶來起碼的收入，為了追求血酬的長期最大化，土匪願意建立保護掠奪物件的秩序，提供一定數量的公共產品，因此，在自己的地盤裏，土匪比警察還要嚴厲地打擊犯罪。在國統治鏈條上的官僚集團實際上是一支貪殘血腥的貪汙大軍，他們或者如同千里長堤上的螞蟻，雖則每每動靜不大，但最終必使「千里長堤潰於蟻穴」，而勢力比較龐大的官僚集團則明

火執仗形如剪徑揩油的江洋大盜，每每在短時間內獲得令人咋舌的社會財富。官僚們在中國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普遍流氓化，往承擔了把中國社會逼進死胡同的歷史重任，其盤剝手段的殘酷和血腥恐怕連十惡不赦的暴徒都要自愧不如。吳思用「劉謹暗流」的比喻詳細述說了官僚集團聚集自己血酬的血腥盤剝，劉謹在五年時間裏聚集起了自己工資收入五百萬年不吃不喝都聚集不起來的鉅額財富，極其有力地說明瞭官僚集團的血酬在社會財產中的比重是非常高的。中國的帝王們按理應該是天下的當然主人，他們似乎不應該追求並獲得所謂的血酬，但是，中國向來沒有天下萬世不易的皇統，帝王中由於人生苦短而追求享樂的昏君比比皆是，老百姓掏了腰包卻得不到公共服務的情況時常存在，同一種公共產品被不同的政治集團多次變賣，乃至同一個政治集團也會多次拍賣同一種公共產品，而老百姓甚至被逼迫為購買鎮壓自己的各種武器付款。崇禎末年加增於民間的遼餉、練餉和剿餉等多種費用就是同一種公共產品被同一個政治集團多次拍賣的明顯例證。

吳思的《血酬定律：中國歷史中的生存遊戲》揭示了人治傳統濃厚的中國社會具有不同於西方社會的元規則，說明力量最強的暴力集團在中國制度體系中的支配性地位，並用大量社會事實證明瞭制度和規則在絕對權力面前的絕對失效。因此，中國社會中的規則不論多麼完善，只要政權當局擁有規則之外的其他絕對權力，那麼權大於法和權力選擇並決定規則的政治格局就會實質性地延續下去；而

只要政治最強力者具有選擇並決定規則的絕對權力，那麼政治統治集團就難免會具有血酬暴力集團的屬性。◆

中曾根康弘

日本二十一世紀的國家戰略

葉紘麟 /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國關組

日本的外交戰略一向有兩個特徵，其一是「跟隨世界的主要潮流」，也就是學習其他優勢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的縱橫捭闔之道以求生存，例如明治時期以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方式、追求成為「近代化國家」；而另一特徵則是「動輒得咎」，而常在乎鄰近諸國的立場；這是因為日本剛好處於中、俄、美三大國「勢力範圍」的交會點。不過總體來說，日本外交似乎欠缺了一套基於自身主體性的「國家戰略」，使得日本的外交主張一向不為其他國家重視，而有「一流經濟、二流政治、末流外交」之稱。最為鮮明的例子莫過於在波灣戰爭結束時，復國的科威特王室於《紐約日報》刊登廣告，感謝參與多國聯軍作戰的各國，而日本是以金錢贊助多國聯軍活動的「大戶」，竟然榜上無名。

中曾根康弘當政時期的日本也免不了這樣的情況。中曾根康弘當政的五年中，一方面要進行「戰後政治總清算」，讓日本邁向正常國家的道路；但是另一方面又必須維持外在的和平環境，而不讓美國、中國與前蘇聯產生不滿。

以靖國神社參拜的問題來說，中曾根本人希望以靖國神社問題對「戰後政治總清算」作出突破，但是又必須要以「二拜、二拍手、一禮」的禮拜方式，澄清自己的參拜方式「不涉憲法『政教分離』問題」。而針對教科書問題，中曾根一方面允許與戰後主流史觀不同的歷史教科書《新編日本史》通過文部省審查，另外一方面又因應中國與韓國的壓力要求作者修改內容。另外在國際社會上，中曾根也企圖在「鷹派的美國」、「抬頭的中國」以及「沉潛的蘇聯」之中，尋求對東南亞的接觸以及在國際議題上發聲的機會，然而卻常被反對派譏為見風轉舵



書名：日本二十一世紀的國家戰略

作者：中曾根康弘

譯者：聯慧

出版者：海南出版社

出版地：海口

出版日期：2004年3月

頁數：277頁

ISBN：7-80700-035-X

的「風向雞」，有些人甚至指摘他是企圖恢復戰前軍國體制的「右翼」；在二〇〇三年眾議員議員選舉時，年過八十的中曾根揚言要在小選舉區繼續參選，而被稱為戀棧權位、不願交班的「老害」。

但是不可否認的，中曾根康弘的確是位具有自我哲學的政治人物，而他也曾經因為率直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張，而為當時的首相吉田茂斥為「非國民」。比起「看著新聞要求而發言」而獲得日本史上最高支持度的前首相細川護熙而言，中曾根能夠勇敢提出其主張誠屬不易。而目前在日本政壇朝野執牛耳的小泉純一郎、小澤一郎等人，其國際觀也大多承續了中曾根的想法。

雖然此書是以談話錄方式進行，結構看似鬆散，但是由於討論的是在日本國內長期爭辯不休的議題，且中曾根是以有系統與背景的方式進行討論，而增加此書的可讀性。本書所敘述的範圍相當廣，除了國家論、日本文化論、西洋哲學到佛學等廣泛的知識討論之外，也包括具體政策方面的國家安保問題、憲法修正問題與教育改革問題等，由此可看出中曾根的確是一位「正統的保守主義者」。

本書主要提出日本的兩大弊病：第一個是日本的「資訊貧乏」，即主要資訊來源操縱於特定團體以及以美國為主的情報之中，第二個是日本學界自安保鬥爭以來普遍的「反權力、反體制」傾向，造成日本整體的研究能力不足，從而開始闡述日本必須有一套以日本為主體之國家戰略的重要性。中曾根認為，日本追求自身的國家戰略，必須由內部與外部兩層次著

手進行。

就外部而言，日本應該強化多邊外交、追求兩岸問題的談話解決爭端、以日美安保體系解決與中國、北朝鮮的爭議，並設立「東亞金融協議會」來強化日本在區域整合中的影響力，迎戰「第三次開國」；就內部而言，日本必須產生一位直接民選、由人民直接授權的首相，制定重振財政基本法，擺脫國債的壓力，調整產業結構，重建產業界—學界—國家三位一體的研究體系，並且重新制定一部「國民參與的新憲法」。中曾根將日本過去、現今與未來面臨的環境不斷穿插其中，例如「日本史上的三個問題」、「大東亞戰爭」、「東京裁判史觀」、「全球化與民族主義」、「核能安全政策」、「生命科技革命」等，以一個大脈絡的方式闡述日本的國家政策。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中曾根在書中一再提到「樹立思想哲學的重要性」，在一個「欠缺自身哲學」政治家充斥的日本政壇，中曾根康弘是個異數。

如前所述，中曾根康弘是個標準的保守主義者，例如對於教育基本法的修正、對民族教育的堅持、核武裝政策的檢討、首相直選制等問題，無一不是站在保守派的立場進行發言。然而不可否認的是，由於同位於以中國為首的「天朝」體系¹以及以美國為

¹ 「天朝體系」一詞是費正清等學者在稱呼過去東亞國際關係中，以「中華帝國」為中心與其周邊國家如朝鮮、安南等國的互動模式；即中國的周邊國家是以對中國「朝貢」的方式換取其國家的安全與合法性，而中國獲得了此體系中「天朝」的地位。而日本自七世紀聖德太子以來便以獨立姿態，未加入「天朝體系」之中（也就是說，日本的天皇並不是由中國方面「冊封」的）。而目前如《一中帝國大夢》的作者譚若思（Ross Terill）等人，對於目前中

首的冷戰體系拉扯的結構環境之間，日本與台灣有著同病相憐的困窘；而在舊冷戰體系逐漸受到全球化浪潮、區域整合等國際思維挑戰之時，冷戰的陰影卻依舊在台灣與日本徘徊不去。台灣擁有一般國家所有的人民、領土、政府、主權四要素，但是不但和「以國家為主的國際組織」無緣，也難超脫冷戰的架構去思索、實踐兩岸關係可能的新模式。而日本在國際社會上付出的心力數一數二，仍然受到占領時期所制定的憲法所限制；連一個正常國家應當存在的軍隊也無法擁有，還必須改用「自衛隊」的名稱運作。

當台灣與日本面臨同樣的困境時，中曾根康弘對於新世紀日本的建言就變得格外重要，一方面是我們對鄰國日本未來的走向的確有必要了解，而這樣的了解必須摘下「軍國主義復甦」的有色眼鏡；另一方面，日本現在發生的問題，也是台灣現在或未來將要面臨的課題。或許，如中曾根康弘般，一個「有自己的一套哲學」的政治家，也是目前我們應該期許、期待的。◆

國在東亞各國中發揮影響力的評估，便常借用「天朝體系」等辭彙來形容；本處也借用了這樣的說法。

David Hel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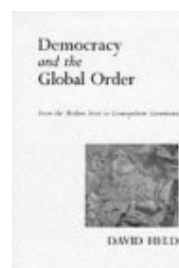
Democracy and the Global Order: From the Modern State to Cosmopolitan Governance

黃士豪 / 政治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民主如要存續昌盛，必須建立新的組織與法律機制」(p.280)。這是 *Models of Democracy* 一書作者 David Held 在面對當今區域化及全球化的國際局勢時，提出對民主政治新的思考，而這也正是《民主與全球秩序—從現代國家到世界治理》一書最主要的關切。

由於全球化使得沒有一個國家能自外於其他國家或者整體的國際秩序，民主理論中所談到的由人民選出代表，代表向人民負責的觀念將會產生一些問題，這些問題包括：在全球互聯的秩序下，單一國家的決策影響所及並非僅限於該國人民，而其他受此決策影響的國家，卻缺乏人民的代表可對該政策表示意見；此外，國際組織、功能性的跨國組織以及跨國企業的決策都會對世界各國造成影響，而很多國家的人民在其中缺乏代表，也無從向這些組織課以責任。針對這些問題，Held 提出了新的民主思維—普世民主 (cosmopolitan democracy)，期望透過一些理論的建構，使民主與全球化能夠共存不悖。

作者指出今日的國際體系是由一個個現代國家所組成。他認為「現代國家的理念核心是一種不具人格、特權的法律或合乎憲法的秩序，它劃定一個共同權力結構，這種秩序指明是對某社群的掌控與管理的性質與形式」(p.42)，而這種理念的形成與主權理論的發展有關。從布丹、霍布斯到洛克、盧梭，逐漸形成一種「非自然人/虛擬人」的主權觀念，也產生了國家權力與人民主權間的結合問題。他指出，自由代議式民主解決了上述問題，而此種民主



書名：Democracy and the Global
Order: From the Modern State
to Cosmopolitan Governance

作者：David Held

出版者：Polity Press

出版地：Cambridge, U.K.

出版日期：1995年11月

頁數：336頁

ISBN：0745600565

模式也成為世界各民主國家採用的政體。但是，另一方面，由現代國家所形成的國際體系，從西伐里亞模式(the Westphalian model)到聯合國憲章模式，雖然逐漸加強了維持國際合作的機制，然而面對全球化及區域互連日增的國際局勢，仍然有許多問題都仍缺乏解決之道。Held 認為解決這些問題的困難乃在於民主、傳統主權觀念與下列五種現象上產生脫節：國際法、政治決策的國際化、霸權國家與國家安全結構、國家認同與文化的全球化、世界經濟，這五種脫節現象突顯全球化的結構下，民主與民族國家的建構及定位都須重新思考。

了解國際體系的現況後，接下來 Held 提出民主的核心在於將國家之能與人民之權結合的「自主性原則」——一種強調權利義務平等以及自決條件均等的原則。自主性原則主要表達兩個觀念：「人民自決」與「依法受到限制政府」，從這個原則出發，必須有一個「共同的政治行動結構」規範人民的權利義務及政府的權責，並使人民在自決的條件上達到平等。他認為應以「民主思想實驗」的方式，思考、討論何種體制安排是人民所能共同接受的，以及探討民主的條件是什麼。透過民主思想實驗，Held 認為有七種權力領域的自主性喪失，包括身體、社會福利、文化、公民社團、經濟、暴力與強制關係、管理體制及法律體制等面向上的權力不平等，都會影響到自主性原則的確立，所以必須有一個民主公法賦予人民平等的「健康權」、「社會權」、「文化權」、「公民權」、「經濟權」、「和平權」及「政治權」。當然，Held 並非徒抱夢想而完全不顧

慮現實狀況，所以他提出自主性的達成應區分為「理想的」(idea)、「可達成的」(attainable)及「迫切的」(urgent)三種層級，各個政治社群應視能力和資源條件，逐步追求最完美的、以公益為主要意涵的民主之善。

然而在面臨全球化時，必須將上述民主公法與自主性原則放至全球層次來思考，亦即必須建立一個普世的民主法，並據此將全球整合成一個民主的共同政治行動結構，否則單一政治社群內的民主法和自主性的確立必然受到其他政治社群的影響和限制。這個由普世民主法所建立的政治行動的共同結構，理念核心是依民主公法及自主性原則建構一個新的國際秩序。在此僅將有關這一個新的國際秩序的規劃和論述概略整理如下：

一、社群在身體、社會福利、文化、公民社團、經濟、暴力與強制關係、管理體制及法律體制等各權力領域相互聯結，並共同採取一些法律原則，賦予社群內的人民「健康權」、「社會權」、「文化權」、「公民權」、「經濟權」、「和平權」及「政治權」等七項權利。

二、在區域及全球建立跨國的立法、行政機構，在個別的層級中依據基本的民主法運作。此外，在民主法的執行和公共支出的平衡，其優先事項遭到質疑時，也可能以跨國的公民投票來解決爭議。

三、讓國際管理組織受到公共審視，並使國際功能性機構民主化。

四、建立一個代表所有民主國家的權威性議會，此議會短期而言有可能是改造過的聯合國大會或是對聯合國大會的補充，長期目標不是取代聯

合國而是要成為一個不分政體性質，所有國家都參與的「第二議事廳」。

五、擴大國際法庭的影響力，並進而建立國際刑事法庭。

六、建立一支有效的、負責的國際武力部隊來維護普世民主的國際秩序，並進而將民族國家的強制力轉變為區域性與全球性體制，成為非軍事化及超越戰爭體系。

七、在經濟和社會上建立多元化及民主化的機制，保障各階層的利益並保證成人基本所得。

八、人民擁有從地方到全球等不同層級的公民身分，享有各種形式的政治參與機會。

普世民主模式就其理想而言雖非特別創新，但就其理論的鋪陳和建制規劃而言，都相當詳盡，而且經過理論、現況逐步地推演，使得讀者能夠很輕易地掌握本書主要關切的議題和其理論內容。此外，本書分作四卷，從理論、歷史、現況到新的倡議，除了本書主旨外，讀者更能從本書中得到民主、國家、國際體系、全球化等相關概念及現況發展的全般知識，這是本書的另一大特點。

就普世民主模式而言，Held 雖然提出了詳盡的理論及建制規劃，卻仍未解決制度採擇的動機問題。他假設了各國及各政治行為者會因為民主之善而產生建立普世民主的動機，但是就國際現實而言，姑且不論民族情感、族群意識或各國間的歷史仇恨，權力和利益的極大化仍是國家和各國政治行為者追求的重大目標之一；換言之，倘若普世民主模式對於一個國家沒有利益可圖，那麼它將不會願意致力追求普世民主。

誠如作者在本書中所言，大國掌握了國際體系及跨國組織的權力和資源，所以如何使大國願意在普世民主的模式下，與其他國家站在平等的地位上決定國際事務以及如何使小國安心地同意在普世民主的架構下配合國際機制的安排，都是普世民主模式的建立需要克服的難題。筆者認為 Held 對於此項困難也有一定的認知，所以他說普世民主模式只是定出一個可能的改變方向，而非全有或全無的選擇。但是以目前的情況看來，歐洲的統合雖然帶來了全球整合的一線曙光，歐盟的其民主性和 Held 所提出的普世民主架構（一個統合而有立法權的議會、決策者對各國人民負責等）還有一段可觀的差距。

雖然如此，我們仍應肯定 Held 對於民主及和平的重大貢獻。他在本書中指出了現代國家及國際體系所面臨的問題，並建議以民主的方式加以解決，這樣的思考有助於在單一國家之內或國與國之間族群、政治、經濟、軍事安全等議題以和平及文明的方式化解衝突，希望有一天，在一切困難得以克服的情況下，普世民主模式能夠帶來全球和平，使全人類共享真正的民主之善。◆

Merle Goldman &
Leo Ou-fan Lee, ed.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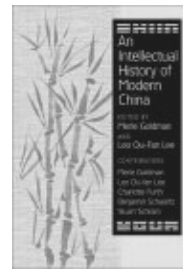
馮先祥 / 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Leo Ou-Fan Lee 與 Merle Goldman 為紀念已故的美國中國思想史大師 Benjamin J. Schwartz，共同編了這本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Cambridge Univ., 2002)¹，而本書也在兩個問題上延續了 Schwartz 的想法，此即什麼是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以及現代中國(modern China)的起點在哪裡？

第一個問題與思想史方法論有關。intellectual 這個字同時有形容詞與名詞兩種用法，因此思想史既可以是研究 intellects (理解能力) 的歷史，也可以是研究 intellectuals (知識份子) 的歷史。本書第一頁的開頭便引用一段 Schwartz 本人對思想史的定義：

「思想史不僅僅包括概念化的領域 (the realm of conceptualization)，它也包括意識生活的整體 (totality of conscious life)。意識生活的整體是指思維的生活 (the life of the intellect)，情緒，想像力，以及情感的每一次變化 (every variety of sensibility)。除此之外，我們絕對不是只有關心思想的生命，一個自我存在的領域 (self-subsistent)，也就是所謂的「觀念史」(history of ideas)；我們也關心與歷史情境息息有關的人類意識 (human consciousness)」²

依此定義，思想史的範圍可謂非常廣泛。只要和意識有關的都可以是思想史的內容，包括對國家



書名：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編者：Merle Goldman and
Leo Ou-Fan Lee

出版者：Cambridge Univ. Press

出版地：Cambridge, U.K.

出版日期：2002 年

頁數：616 頁

ISBN：0521797101

¹ 全書共分 8 章，除了導論以及第 8 章之外，其餘的第 1~第 7 章是由《劍橋中國史》第 12~15 冊中抽選出來的。相關的中文譯文可以由《劍橋中華民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以及《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² Benjamin I. Schwartz, *China and Other Matter*, p. 36-37. 轉引自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p. 1.

的情感，對某個概念的理解，對某件事的態度，觀念的變化等等。這樣的思想史不是獨立而抽象的存在，反而是把思想放在特定的歷史脈絡裡頭。Schwartz 的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West* 就是採取該研究途徑的例子。在這本經典的研究中，Schwartz 認為嚴復對於自由的理解是受到他個人愛國情操的影響。自由在嚴復的眼中變成追求中國富強的工具。這本經典的嚴復研究把思想史和政治史結合在一起。反觀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Modern China*，該書的研究途徑不單只與政治史結合，更試圖整合文化史與文學史等範疇。第三、第四章中，Leo Lee 便認為文學的現代化不但是新文化運動的一部份，文學的批判性也反應了作者個人對外在環境的思考；也就是說，文學的潮流是文化史，是思想史，也是政治史。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歷史的分期。一般咸認為現代中國的起點是 1840 年鴉片戰爭，而本書卻把起點放在 1895 年。書中雖然沒有很明確地解釋為什麼起點是 1895 年，不過我們仍然可以做一些間接的判斷。Schwartz 認為：

「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交是中國現代思想史適當的分界點。在這期間的一些著名人物，如嚴復，梁啟超等等，開始真正對西方思想發生興趣。這與「自強運動」和「洋務運動」時期僅關助於西方思想中與物質技術及社會技術有關的情形相較，呈現明顯的對比。」³

Charlotte Furth 與 Schwartz 的推論雖不盡相同，但仍然得出類似的結論。一方面，1895 年馬關條約的簽訂促使光緒皇帝決定變法，1898 年戊戌變法廢除了八股文，並且設立新式學堂，在此同時，知識份子間的交流方式有了轉變，包括報刊雜誌以及學會的盛行等等。Furth 認為這些都是重大的結構性的轉變 (important structural changes)。此後，傳統士大夫逐漸失去光芒，新式的知識份子成為舞台上的主角，使得中國現代思想史有了新的風貌。所以，從 Schwartz 以及 Furth 的觀點看，1895 年可作為中國現代思想史的起點。

本書在思想史的定義以及歷史的分期上繼承了 Schwartz，涵蓋的年代從 1895 年一直到 1990 年代，我們可以說這是一本二十世紀中國的思想史。根據這本書的看法，二十世紀中國最重要的思想史事件便是 1918 年的五四運動。五四運動的主角大多是 1918 年以後成長的新一代的知識菁英，編者認為，五四運動之後，知識份子的角色與自我形象與傳統士大夫有了明顯的不同，他們不必在政府機關中任職便能有所作為，他們相信自己是拯救中國的關鍵 (頁 4)。而五四運動的精神遺產 — 包括科學與民主、傳統與現代、和民族主義等 — 則一直影響到後面的歷史發展。五四運動表面上是文化史的問題，但事實上五四運動也牽扯到思想史與政治史的發展，因此，若要瞭解中國現代思想史的來龍去脈，就一定要對五四運動的前因後果有所瞭解。這也就是為什麼本書有將近一半的篇幅在討論五四運動的原因 (第一章到第四章)。

³ Benjamin I. Schwartz, 〈關於中國思想史的若干初步考察〉,《中國思想與制度論集》(台北:聯經, 1992), 頁 15。

由於本書是本論文選集，各章的作者不同，然而這全書的論述與觀點仍具備一致性。對於思想史的定義，有關現代中國起點的劃分，以及研究途徑的選擇等等都繼承了 Schwartz 的想法，甚至可以說，本書是某一個學派對於中國現代思想史的研究摘要與精華。若想從不同切面觀察過去一百年中國思想史的風貌，本書值得一讀。◆

【徵 稿】

為能對當代政治學知識發展與時俱進，提升並促進學術之反省對話，推動全國政治學相關系所之學術參與及交流，本刊公開徵求對政治科學相關學術著作之「書評」與「書目」，期許引領暨提升學術研究之風氣。

投稿須知

■徵稿對象：全國政治科學相關系所師生

■稿件內容：

- (一) 書評：針對政治科學相關中、外文學術著作之評論（其中至少應有三分之一以上篇幅作為評論），約 2000 至 2500 字。
- (二) 書目：針對新近出版政治科學相關學術著作之介紹，約 1000 至 1500 字。

■截稿日期：每年二、四、八、十一月十日以前。

■發刊日期：每年三、六、九、十二月五日。

■稿件筆潤：

- (一) 書評經審核後採用者，每篇新台幣壹仟元整。
- (二) 書目經審核後採用者，每篇新台幣伍佰元整。

■本刊物編輯委員會以尊重稿件內容為原則，力求避免修改，唯保留此項權利。

■投稿暨聯絡方式：

- (一) 電子郵件：PoliSciReview@ntu.edu.tw
- (二) 一般郵寄：台北市中正區(100)徐州路 21 號
臺大政治系[政治科學季評]編輯委員會